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叢刊

3

北京出版社

封面题字：唐棣华

封面设计：刘玉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二年 第三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北京出版社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50,000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

书号：10071·423 定价：0.97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二年

老 舍 研 究

- 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 樊 骏 (1)
三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浅探 孟广来 (28)
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 舒 济 (47)

作 家 作 品 研 究

- 郁达夫文艺观点琐谈 李永寿 (67)
鲁迅小说艺术发展初探 王嘉良 (87)
谈《阿金》 黄 楷 (110)
阳翰笙文艺理论批评文章述评 张大明 (117)
重新认识《邪不压正》 董大中 (138)
评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王保生 (151)

青 年 论 丛

- 论“身边小说” 金宏达 (167)
试论冰心“爱的哲学”
——冰心早期作品初探 马璧玲 (185)
吴伯箫现代散文漫谈 白 烨 (209)

争 鸣 园 地

《论民族形式问题》应当得到更准确的评价

——与刘泰隆同志商榷·····丁柏铨 (219)

《说〈雪〉》质疑·····李允经 (234)

也谈《雷雨》戏剧冲突的主线·····潘克明 (242)

现 代 文 学 史 研 究

我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三题·····陈 辽 (255)

试论解放区文学大众化·····李葆琰 (274)

札 记 随 笔

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林志浩 (295)

资 料

谈四十年代茅盾的行踪·····叶子铭 (306)

茅盾生平事迹小记·····艾 扬 (31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举行第二届学术讨论会·····闻 言 (321)

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

樊骏

《鼓书艺人》写于老舍四十年代末旅居美国期间，正当他热爱的祖国从漫长的黑夜走向解放的黎明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部小说，1952年由Hele-na Kuo根据作家手稿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1980年，因为原稿已经丢失，由马小弥从英文译本译回中文，与中国读者见面。三十多年来，在国内，虽然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老舍写过这样一部小说，比如1950年1月14日天津《进步日报》所载《老舍谈美国》（子冈）一文中，就提到“他在美国写了一部《鼓书艺人》”；大约因为看不到作品，没有一部现代文学史和一篇研究老舍的论文提及它。在国外，虽然比较容易读到英文译本，却同样没有引起注意，比如在西方汉学界颇受重视的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和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老舍的专著，印度学者Ranbir Vohra的《老舍与中国革命》（*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ion»), 都没有提到这部小说^①, Vohra 还明确断言《四世同堂》是老舍“宣布归顺共产党中国以前所写的最后一部小说”, 完全无视《鼓书艺人》的存在。在我读到的英文材料中, 只有波兰学者 Zbigniew Slupski 的专著《一位现代中国作家的历程: 老舍小说分析》(«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An Analysis of Lao She's Fiction») 和美籍英国学者 Cyril Birch 的论文《老舍: 幽默作家的气质》(«Lao She: The Humourist in his Humour») 提到了这部小说, 但也都只是用一两句话交待作品的内容, 并没有作任何分析和评价。如果不是出版中文译本, 这部小说很可能就将这样的被人忽视甚至湮灭了。

现在, 我们终于读到了《鼓书艺人》。和一切真正的艺术作品一样, 几十年的风霜雨雪, 加上辗转的翻译, 并没有侵蚀它的光泽, 如今读来依然具有新鲜的魅力; 而且在某些方面, 今天反而能比当初更充分更深入地认识它的成就和意义。
||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 鲜明地反映了老舍的艺术风格和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更在一些重要的方面, 显示出老舍创作的深刻变化, 是他漫长的创作道路中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 它理应受到重视; 在被大家忽略了这么久以后, 使人格外痛切地感到这一点。

—
✓ 《鼓书艺人》通过抗日战争时期一群从北方流落到重庆的鼓书艺人的经历, 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艺人的生活和命运。

① 有意思的是: 这两部著作提到了老舍作品的不少英译本, 包括风行一时的 Evan King 的《骆驼祥子》的英译本 «Rickshaw Boy», 影响不大的 Ida Pruitt 的《四世同堂》的英译本 «The Yellow Storm», Evan King 的《离婚》的英译本 «Divorce», 和 Helena Kuo 的《离婚》的英译本 «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 却偏偏都没有提到同一位 Helena Kuo 翻译的《鼓书艺人》的英译本 «The Drum Singers»。

千百年来，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卖艺一直被看作是卑贱的勾当，艺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始终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保障。在很多人看来，他们不过是任人戏弄的玩物，可以恣意侮辱的贱民。从整体来说，旧中国艺人的生活和命运，带有浓厚的悲剧性。

作为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老舍要比一般人更清楚地懂得艺人的不幸和痛苦。他们的悲剧不只表现在大家容易觉察到的重大灾祸之中，或者当矛盾冲突激化到不可收拾之时；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每时每刻，每个细小的环节，体现在与周围人们最一般的接触交往中间——在不为局外人注意的时间和场合，甚至在他们自己都是不知不觉之中，同样演出着一出出悲剧。只有着重地从这些方面入手，才能充分认识和揭示艺人的悲剧。

所以，《鼓书艺人》没有历来描写艺人的作品往往具有的传奇浪漫的色彩，或者哀婉缠绵的情调，而是从普通的日常生活画面上，从平淡无奇的生活事件和心理活动中，展示悲剧的内容。小说的主人公方宝庆来到重庆，立刻着手筹办书场。小说生动地勾勒了他在书场开锣那天的紧张活动和惶恐心理。他拜会各界人士，恳求他们帮忙照应；散发大批请贴，邀请人们赏光捧场。他担心浪荡子弟调戏女艺人，害怕看白戏的寻衅闹事，却不敢得罪任何一个。他知道稍有疏忽，都会导致书场的垮台，自己的命运完全握在别人手里。为此，“他鞠躬，谁到了眼前就跟谁握手，满脸堆笑，叫人生不起气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他应付得当，没有出事，演出也获得了成功。小说用“又过了一天，平平安安的”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结束了有关的描写。但正是这样的“平平安安”，最真切地写出了艺人到处都是低人一等、随时都得卑躬屈节的身份，写出了他们生活的辛酸和艰难。

富贵人家要宝庆他们除夕去唱堂会，一家人吃顿团圆饭的打算因此落空。堂会唱到清晨两点，街上空无一人，连抬滑竿的都

回家吃年夜饭去了。“间或有一家，窗帘里面还有亮光。只听见里面围席而坐的人，在哈哈地笑着。”而“落在他们的衣服上，脸上的雪都化成了水。”宝庆的养女秀莲既累又睏，心里难过得连话都不想说，“眼里满是泪水”。这寥寥几笔白描下来的生活镜头，突出地表明了这些给别人带来欢乐增添节日气氛的艺人，自己却落进了无法排解的凄凉哀愁之中。舞台上那些才华洋溢、光彩夺目的演出场景，和舞台下那些污浊丑陋、黯淡无光的生活画面，同样以强烈的对比，透露出隐藏在悦耳的琴声和鼓点、迷人的演唱和笑容后面的艺人们深沉的悲哀。

年轻的女艺人所受到的蹂躏，更清楚地表明了艺人备受侮辱的痛苦处境。琴珠、秀莲和大凤（后者并不卖艺，而是艺人的女儿），为人、经历和所追求的，都各不相同，却没有一个逃脱被人欺凌的厄运。在这里，作家同样没有编造香艳的故事，渲染感伤的情调，以制造艺术效果；而是把这些事件写成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小小风波，着重刻画的是艺人被扭歪了的、已经变得麻木不仁、自轻自贱的心理。玩弄她们的，自然不把这当一回事；亲朋好友，同样不以为怪；除了秀莲，她们自己对此也不以为耻，不以为苦。“干我们这一行的，谁能清白得了”！世世代代的悲惨境遇带来的精神戕害和心灵创伤，比起耸人听闻的桃色事件，的确更能说明艺人的悲剧。他们越是漠然处之，事情越是平淡无奇，就越能显出其中强烈的悲剧意味。

即使他们自爱自重，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又何尝能够得到好的待遇！宝庆的哥哥方宝森，能弹善唱，善良正直，尊重自己，更珍惜艺术。他在认清“一辈作艺，三辈子遭罪”以后，坚决不肯卖艺，靠弟弟养活自己，因此被人称为“窝囊废”。他的自尊固然保持了个人的清白，却不得不照样使用在他看来是可耻地挣来的金钱，更丝毫没有改变卑贱的处境和屈辱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无所作为恰巧说明他比别人更早地为生活所毁灭，至

少同样是对于生活的屈从。一位才华出众、品格高尚的艺术家成了“窝囊废”，这个绰号这个形象本身，就蕴含着作家对艺人多么深厚的同情、对于旧社会多么愤懑的抗议！

小说所描写的，无一不是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生活场景，却又无不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无不反映出艺人的悲剧命运。虽然它们缺少曲折离奇的情节、伤感哀艳的情调所容易产生的那种表面的、一时的戏剧性效果，却因为写的是最普通最一般的日常生活，而更能说明这种悲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更能显示出生活本身的全部份量和丰富含义。生活宛如一个无底的深渊、一张无边的罗网，艺人生来就落入其中，而且再也无法脱身；生活更象沉重的碾砣，在日复一日地、无声无息地碾压着他们。飞来的横祸不一定降临到每个艺人的头上，更不是天天都会遇到；却决没有一个艺人能够幸免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折磨。这才是他们的悲剧的深刻含义和沉重内容之所在，也是这种悲剧最令人感到痛苦和震惊之所在！

专制制度的“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①。旧中国在对待艺人的态度上，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个原则野蛮凶狠的本质：几乎是整个社会都蔑视艺人，剥夺他们的各种权利，使他们变得“人不成其为人”；连艺人自己都把“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视为生活的真理。《鼓书艺人》就是以充分揭示艺人的这种悲惨经历，有力地控诉了旧中国的罪恶制度。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一向以善于描写中下层市民社会著称，尤其是关于城市贫民的刻画和城市底层生活的描绘，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一个作家超过了他。在旧中国，为数众多的下层艺人也生活在城市的底层。《鼓书艺人》通过不同类型的艺人形象，真实地写出了他们虽然在物质上不一定最贫困，精神上却被认为是

^①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M致R(1843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最低贱的；写出了他们心灵上所忍受的耻辱与创伤，往往比一般的劳动人民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悲剧。和《月牙儿》中的暗娼，《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夫，《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一样，《鼓书艺人》以其对艺人的生动描写，揭开了旧中国城市的又一个阴暗的角落，成为老舍所描绘的城市底层社会的生活画卷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在对于封建时代的旧文艺的否定和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新文艺工作者对旧戏剧、旧曲艺之类的传统艺术，以及从事这些活动的旧式艺人，都相当隔膜。他们的创作中也很少写到这些^①。老舍是少数例外者（如欧阳予倩、田汉、吴祖光、赵树理、马健翎等）之一。他从小喜爱传统的曲艺戏剧，熟悉旧式艺人的生活，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也曾经在作品中多次写到过他们。《鼓书艺人》不仅是老舍自己这类题材的作品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在整个新文学创作中，在这以前也还没有一部作品曾经如此严峻如此有力地描绘过艺人的悲剧。与田汉的《名优之死》、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这样一些同样取材于艺人生活的、早有定评的优秀作品相比较，《鼓书艺人》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上，从更多的方面，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艺人的生活和命运。这是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个贡献。

《鼓书艺人》还很有代表性地表现出老舍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一般都提到他的独特的幽默讽刺艺术，和他关于北京风土人情的生动细致的描写。这些，无疑都是老舍创作的重要特色，形成他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这些，曾经是作家自己所刻意追求的，也往往是我们接触他的作品时所最容易感觉到的。但老舍不仅仅是幽默作家，也不仅仅是北京的风

^① 与新文学作家形成鲜明对比，鸳鸯蝴蝶派作家写了不少取材于艺人生活的作品，象秦瘦鸥的《秋海棠》曾经风行一时。

俗画家；作为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语言艺术大师，他还有更为重要、更为内在的长处和特点。这需要从他的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特色去寻找——那就是他善于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含义，在作品中反映重大的社会现实，提出尖锐的思想命题。老舍的笔下所塑造的人物和所描绘的生活，都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的，既没有将人物神化、英雄化，也没有把生活传奇化，编造一些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在平淡之中演出着悲剧或者喜剧，给人以思想上的启示，感情上的激动，和艺术上的享受。他的幽默讽刺、他的那些色彩绚丽的北京风光的描写，首先也在于与这样的生活画面、生活细节结合在一起，才以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生活情趣，吸引了读者。

应该说，从创作一开始，比如在《老张的哲学》、《二马》等早期作品中，老舍已经显露出这种严格地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特色了。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磨炼，到了晚年的《茶馆》和《正红旗下》，这种艺术风格更为人们赞叹不已。而《鼓书艺人》，既没有什么笑料，也不以北京为背景，主要就是依靠朴素地、本色地描绘日常生活取得成功。在这里，老舍的这个特长有了进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也就比以往的作品表现得更为显著，更容易被人们识别出来。别林斯基在阐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时，主张“现实诗歌的任务，就是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用这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灵魂”。他特别推崇那种“在外表的朴素和琐屑中是多么有力和深刻”的作品^①。在《鼓书艺人》中，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无奇，一切又都是那么惊心动魄，表现出来的正是别林斯基所称道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特色和成就。而这，也正是老舍独特的艺术风格的核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可以帮助

^①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中译本）第一卷，第180页。

助我们了解老舍的艺术风格和它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二

老舍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以其对于人民群众和国家命运的真挚关切，对于城市中下层市民的生动描绘，引起文坛的注目。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进而以《离婚》、《骆驼祥子》等优秀作品，确立了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历史地位。他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主题，而且比许多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反帝色彩。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爱国主义作家、民主主义作家。但在前期创作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弱点。《鼓书艺人》的意义，还在于突出地反映了他在克服前期的弱点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这部小说，不仅以上面所提到的它本身的那些成就，吸引我们的注意；更以它在老舍整个创作道路中的这种地位，要求我们作更多的分析。

那么，《鼓书艺人》究竟与老舍原先的作品有什么不同？表现出他思想和创作上的哪些发展变化呢？

首先，在《鼓书艺人》中，老舍不只是描写旧中国艺人的苦难，而且写出了他们的觉醒和反抗。作品中的艺人不再只是消极地忍受着非人的磨难，而且成为新生活的积极寻求者。宝庆和秀莲都不再甘心沿着千百年来的艺人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他们的身上已经萌发出为历来艺人所未曾有过的新的东西。小说不是以自甘堕落的唐老四一家作为主要人物，也不以善良正直却又无所作为的窝囊废作为主要人物，而以宝庆和秀莲为中心，着重描写了他们的渴望和追求，这就清楚地说明作家注意的重点已经从人民的苦难转向人民的抗争了。

从开始创作以来，老舍写得最多和写得最为成功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灾难，是他们如何被生活所吞没所毁灭的悲剧。

有些作品不一定正面描写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以沉重的悲剧告终，作家所着眼的是人们对不合理生活的屈从，或者与之同流合污。和这样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鼓书艺人》所刻意描写的却是人们对于旧世界、旧的生活秩序的反抗。秀莲对于生活还很不了然，正睁着双眼，怀着疑问，注视着思考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但凭着直觉，她不屑与琴珠那样既卖艺又卖身的艺人为伍；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确地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她不愿意任人玩弄，“我要的是爱情”。当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别人认为“从来没听说过这么荒唐的事”，她却希望“一个个字象奔腾的大红马，能把她载进一个新社会”，从此永远离开“满是娼妓、小老婆和肮脏金钱的世界”。她向往的是象新式演员那样“自由自在”和“受人敬重”的生活。尽管这些想法和行动还局限于争取个人的幸福，却都表现出她再也不愿意苟且地卑微地生活下去，听凭别人的宰割，而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表达了她对于强加在艺人身上的社会秩序、生活准则的极端厌恶和坚决背叛。她寻求的是自古以来艺人从未获得过的自由、独立、文明的新生活。宝庆作艺多年，却“跟有些卖艺的不一样”。他鄙视依靠女儿卖淫为生的唐老四一家，而以“我们是清白人家”自傲。他反对艺人们习以为常的买卖人口的勾当。他对秀莲有一种真挚的爱怜和明确的责任感：保护她，指点她，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比起亲生女儿大凤，他更疼爱秀莲，不仅因为她身世可怜，能卖艺挣钱，更因为她天真善良，才艺出众。与秀莲谈心，成为他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刻。这些，都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最高规范。他不愿做亡国奴，不惜颠沛流离，来到重庆，并且反复琢磨如何使自己的艺术为灾难深重的民族效劳。在演唱旧词时，也倾注了爱国热情；有机会参加抗日宣传，演唱新词，更引以为荣，全力以赴。艺术上他不保守，认为“总得不断地学点新玩艺儿”。而他最大的夙愿是办个艺校，“传授出一代艺人来”，使他们“成为出色的演员，而不是普

通的艺人”。宝庆不象窝囊废，停留于个人的洁身自好；也胜过秀莲，追求的不限于个人的解放。他所思考和寻求的要宽广深厚得多，包括了艺术的创新发展和新一代艺人的培养教育，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的是新的艺人新的艺术的美好蓝图。象秀莲和宝庆这样，他们的觉醒和追求，已经不同于历来的艺人，也和老舍过去创作中的主人公有明显区别。以这样的人物作为描写的主要内容，说明了老舍思想和创作的重大变化。

当然，在这以前老舍并不是没有写到过受压迫者的挣扎，象祥子的“三起三落”就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对于生活也曾有过自己的企望和憧憬，但这只是一种朴素的、原始意义上的愿望，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宝庆父女已经具有比较明确的民主主义觉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和反抗。同样的，老舍的创作从抗战爆发以后就开始注意表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表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斗争，但那些描写往往因为缺少生活实感而写得不够成功。例如《四世同堂》写得最精彩的，仍然是守旧的北京市民的人情世态，而不是他们的抗日活动。《鼓书艺人》是老舍作品中第一次真实地、成功地写出了受压迫者的觉醒和抗争，写出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这是他过去创作中所未曾有过的。

其次，和作品内容这种变化相适应的，老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老舍总是在一个相当狭小的天地里塑造人物，对于他们与整个社会、时代潮流的内在联系，注意得不够。他更擅长的是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而不是反映时代的风云和社会的变动。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鲜明的个性，却常常缺乏明确的时代特征。与此相关的，老舍习惯于在近于凝固的状态中描写人物，很少写到生活的变化，尤其是生活前进的步伐所带来的积极影响^①。在他创造的艺术世界里，

^① 短篇小说《老字号》和《断魂枪》写到了生活的变化；但作家的用意并不在于表现这如何推动人物的变化，而是反衬他们怀旧的心境，这些人物仍然是凝固不变的。

陷入贫困、痛苦、愚昧、丑恶之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无论今天还是明天，都没有变化的可能：生活永远是这样，他们也只能永远是这样。他的那些叙述人物悲惨生活的作品，沉重得令人感到窒息。就是充满了嘻笑戏闹的所谓幽默作品，包括象《抱孙》那样纯粹闹剧性的小品，人们在笑声中感受到的，也仍然是作家对于人生无望的叹息。有些作品因为离开了时代和社会，从人的本性寻找产生悲剧的原因，还流露出近乎宿命论的神秘倾向。在那个时期里，老舍虽然被人称为幽默大师、笑匠，他和契诃夫、卓别麟这样一些有过同样称号的艺术家一样，作品中都有一种浓重的内在的悲剧意味，一层淡淡的、模糊的悲观色彩。

在《鼓书艺人》中，老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有了明显的变化。他把时代潮流写进了小说——不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而且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动力，渗透在他们的心理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宝庆父女的觉醒和抗争，他们的生活理想和艺术要求，都是历史的产物，打上时代的印记。正是通过时代潮流所给予人物的影响，写出了与历来的艺人不同的新的性格特征，写出了艺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历史性变化。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宝庆的爱国热情，使他努力把自己的艺术活动与民族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因此推动他改造旧的艺术。他们一再提到“从前人都看不起戏子和唱大鼓的，……可是如今改样儿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人家就不能看轻咱们。”他们从日益高涨的民主潮流中吸取反抗封建压迫和社会歧视的力量。宝庆和秀莲所以敢于抗拒王司令强娶秀莲作妾的企图，他们所以能够勇敢地生活和抗争，即使一再受到挫折，仍然没有被生活所压倒，都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和觉悟。他们又说：“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不作兴买卖人口。”虽然这“民国”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低贱地位，买卖人口依旧是常事，他们还是从“前清”到“民国”的变动中，意识到应该尊重别人和自己，把人当作人，唾弃买卖人口的恶习。这种觉悟同样来源于时代的

进步。他们从现实的变迁中，明白了新的道理，接受了新的思想，产生了新的渴望和追求。他们都不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孤立的存在，也不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之中；而是汇入时代的洪流，经受着社会变动的冲击，并且与之一起发展变化，一起前进了。没有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就没有这样的宝庆和秀莲。

小说将近结束时，革命作家孟良跟宝庆谈到时代潮流给予人们的影响，并且指出：“您的行为总是跟着潮流走”，“您跟她（指秀莲——引者）都卷进了漩涡”。可见作家是有意识地描写时代潮流如何推动着艺人前进的。这是老舍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变化。

《鼓书艺人》所反映出来的老舍思想和创作的发展，还表现在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描写上。长期以来，这方面的描写曾经是老舍创作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他多次写到革命者或者自以为革命者和貌似革命者的人，但这些形象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象《骆驼祥子》里那个朝秦暮楚、寡廉鲜耻的投机政客阮明，《离婚》中嘴上挂着革命词句的公子哥儿张天真和马克同，还有《猫城记》里带有象征意味的“马祖大仙”、“大家夫斯基主义哄”、“扑罗普落布拉扑”、“红绳军”等，都表明老舍当时对于革命和革命者有过明显的误解。虽然有些同志解释说作家的原意并不是把他们作为革命者描写，而是通过他们揭露嘲讽欺世盗名的假革命（如前两者），或者批判革命政党的“路线错误”（如后者）；因此非但不应该把这些形象、这些描写笼统地和革命等同起来，反而需要在那些夸张的、漫画式的勾勒中，领会作家对于革命的“真知灼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又将如何理解老舍作品中另外一些形象呢？象《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浑浑沌沌、醉生梦死的同学要刻苦学习，最后因为行刺军阀而遭杀害；象《黑白李》中的白李，他自称在敲地狱的门，从事组织人力车夫的活动；还有

《月牙儿》中的那个“新爸”^①。老舍都是明确地把他们作为革命者，并用严肃的、赞扬的笔调加以描绘的。可是他着重表现和肯定的，是他们正直的人品，并非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信念；相反的，无论是李景纯的个人恐怖行动，还是白李鼓动人力车夫捣毁电车的盲动行径，都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活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反而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他们是好人，但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对于周围的人们和生活，也没有起到革命者应有的积极作用。对于革命和革命者缺少实感和理解，使这些形象写得不够准确。直到四十年代中期的《四世同堂》中，关于钱默吟和祁瑞全的抗日活动的刻画，前者带着神秘色彩，后者显得模糊不清，仍然留着老舍不善于表现革命和革命者这一弱点的痕迹。

《鼓书艺人》的又一个重大的变化，就在于真实地描绘了以孟良为代表的进步文化界和革命力量，以及他们给予艺人社会的深刻影响。孟良是老舍作品中第一个写得较为成功的革命者形象，在这个形象中着重地写出了革命对于宝庆父女奋发上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孟良的那个进步文艺团体一起演出，使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多么自由自在”的新式演员，第一次懂得艺术和艺人都是“受人敬重”的，从而加强了他们对于合理生活的向往。孟良一面赞扬鼓书艺人的成就和作用，一面强调需要改变演唱的内容，同时又自愿为他们编写新词。他的热情友好，推心置腹，使宝庆激动不已：“多少年来，我一直盼着能碰见您这么个人。我愿意为国家出把力气。”他因为从此报国有门而格外感激孟良，孟良成了他政治上艺术事业上的引路人。孟良的热诚和关切，同样赢得了秀莲由衷的信赖和尊敬。年龄悬殊，相识不久，都没有妨碍她把跟最亲近的养父都不便启口的事情拿来向他请教，把他当作能够指

^① 老舍在《我怎样写〈大明湖〉》中说：“在她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这个人物就是《月牙儿》里的“新爸”。